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徐锦芬 刘文波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 430074; 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立足于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聚焦外语教材建设的具体路径,围绕目标设定、教材选材、活动设计三大环节探讨外语教材建设如何完成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第一,如何设定多元教学目标,将语言、知识、技能、思辨与德育融为一体;第二,如何结合民族性和世界性进行外语教材选材;第三,如何结合学科特色和学生特点设计教学活动,以实现教学目标和教材使命。本文最后提出了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未来方向,为相关学术研究及实践性探索提供启示。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语教材;目标设定;教材选材;活动设计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1)05-0073-07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1.05.008

1. 引言

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小到个人日常生活,大到国家政治经济事务,语言都发挥着社会交际、信息传递的重要功能;语言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在构建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情感纽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语言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安全密切关联,对国家安全产生基础性、潜在性和长远性的影响(黄德宽 2014),语言也是全球治理的安全保障、重要领域和安全战略资源(沈骑 2020)。

早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而外语能力是提高国际话语权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外语教育蕴含的“安全意义”不容忽视,其中外语教材发挥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因为教材是教学的基本要素、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实现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外语教材的建设对于外语课程教学、人

作者简介:徐锦芬,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二语习得、教师发展。电子邮箱: xujinfen@hust.edu.cn; 刘文波,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教师发展。电子邮箱: ccnuliuwenbo@126.com

* 本文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外语教材研究项目资助。

引用信息:徐锦芬、刘文波. 2021.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与路径[J]. 当代外语研究(5): 73-79, 120.

才培养、学科建设乃至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据此,本文将分析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聚焦外语教材建设的具体路径。围绕目标设定、教材选材、活动设计三大环节探讨外语教材建设如何完成服务于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

2.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

教育部教材局指出,“十三五”期间,教材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地位突显。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来抓好教材建设。2021年5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岩司长也在发言中强调教材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剧本,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体系,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外语教材建设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紧密关联,对于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维护国家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国家发展角度而言,为满足不断变化的国家、社会、个体的发展需求,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在不断调整与完善,外语教材编写思路 and 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材在编写理念上中外结合、不断更新,教学材料的安排从以语法为纲转为注重结构、功能和主题的融合,教材培养重点从关注语言基础和技能发展为强调综合能力和思维,基本契合社会 and 个体的发展需求和相应时期的国家英语教学政策规划。

另一方面,在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一大要义是服务于国家的语言安全规划。Adamson(2004)强调外语教材传递的知识既包括语言知识本身,也包括历史文化、人文知识、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等非语言知识。外语教材本身承载着价值和意识形态(Weninger & Kiss 2013; Curdt-Christiansen & Weninger 2015; Feng 2019)。也就是说,较之其他学科教材,语言在外语教材中既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与目标,也是传递新知识、新观念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外语教材承担着三重使命:第一,维护语言和文化安全。语言主体的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一大重要内涵,实现文化安全的一大要务是建立和谐的语言关系,维护语言主体安全,形成多语共存的格局;第二,引导外语学习者进行身份构建、价值塑造;第三,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满足特定时代需要,为国家培养既精通外语又具有民族精神和国家文化安全意识的高端人才,以提升国家外语能力,服务于国家安全事务。外语教材的这三重使命对教材建设中的目标设定、教材选材 and 活动设计产生影响。

3.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路径

考虑到外语教材服务于国家安全的三重使命,教材在目标设定上应当体现多元化,在选材上应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在活动设计上应考虑学科特色和学

生特点,以培养具备国家安全意识和综合素养的外语人才。

3.1 外语教材目标设定

基于外语教材的本质属性和多重使命,应当科学系统地设定多元目标。教材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素材,是经历一系列复杂挑选过程后形成的产物,反映了政治决策、教育理念、文化面貌和语言政策,教材通常致力于塑造学习者的国家、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Curdt-Christiansen & Weninger 2015),这就意味着除了语言、知识和技能类目标,外语教材的建设还应当关注学生的内在成长与发展,重视情感、文化和价值观维度,形成清晰的德育目标。此外,仅仅通过教材向学生传递文化知识也还不够,需要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促使他们积极反思,才能形成对文化、自身和他者一种批判性的认识(Weninger & Kiss 2013; Thongrin 2018)。也就是说,思辨能力既是外语教学的目的,更是促成有效育人的桥梁,应当是外语教材建设的另一重要目标。

为促成多元目标的有效实现,在设定目标时需要关注针对性和协调性。针对性是指教材目标不仅要涵盖语言、知识、技能、思辨、德育等多个维度,而且要具体、清晰、有针对性地体现在教材编写的宏观目标和每个单元的微观目标之中,使得学生的外语学习和使用符合语言规范、语言道德和语言安全的标准。具体而言,知识目标应界定学生需要掌握的主题内容和专业知识等,语言目标应明确学生应掌握的语言点,技能目标需要明确将考查何种语言技能及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思辨目标则要评估学生理解、分析、判断甚至批判素材中文化情境和价值取向的能力,德育目标应当界定学生需要理解何种文化概念、价值观念,培养何种情感态度。与语言、知识和技能类目标相比,思辨和德育层面的目标从界定到表述可能更具挑战性,需要对宏观目标进行科学拆解,并且建立相应的元话语体系予以支撑。例如笔者主编的《新目标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二版)》(以下简称《新目标》)中将批判思维技能进行系统梳理,具体界定并落实到每个单元之中(表1)。同样,德育目标也要循序渐进地体现学生从认识、理解、赋予价值到形成自身价值体系的过程(徐锦芬 2021)。

表1 《新目标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二版)》涵盖的批判思维技能

第一、二册批判思维技巧	第三、四册批判思维技巧
1 Assessing the validity and strength of an argument	1 Defining key terms
2 Identifying the links between ideas	2 Putting the given information into your own words
3 Identifying different arguments	3 Translating the given information into visual form
4 Asking thoughtful questions	4 Generating innovative strategies
5 Solving a problem	5 Identifying recurrent themes
6 Drawing implications	6 Viewing an issu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7 Reasoning for an argument	7 Making a case against an argument
8 Recognizing weaknesses in an argument	8 Interpreting the given information through examples

同时,各类目标应该协调统一、互为支撑促成目标的共同实现。这种协调性主要体现在难度层次上,同一册甚至同一单元不同类型的目标都应符合相应学生的认知水平,符合层层递进的认知规律,语言、知识和技能目标为德育和思辨目标提供支撑,而德育和思辨目标则为前三类目标提供引导并创造实践情境。例如,在语言知识和技能尚聚焦于初中级目标的情况下,思辨目标可以围绕认识和理解这一认知层次来设定;同样,德育目标可以要求学生认识和理解素材和活动背后呈现的文化和价值观。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教材可以进一步要求学生开展应用和创造性思辨活动,并将良好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价值体系。

设定了针对性强、相互协调的多元目标之后,还要采取合理可行的方法来评估目标是否达成。考虑到时代发展、学习者学习情境和需求不断变化,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教师密切关注学习者反馈(徐锦芬 2021),尤其是思辨和德育目标的实现很难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历时性学习者数据的支撑,包括学生完成各类教材任务时的口语、书面输出数据、学生的教学反馈和学习日志、教师对学生的观察和访谈等等。因此我们提倡人机结合、定性定量方法相结合来获取学习者数据,以全面科学地评估教材建设的效果。

3.2 外语教材选材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39-40)指出,“在教材建设上要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在教材内容的选择上应自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培养具有前瞻思维、国际眼光的人才提供有力支撑”。为了引导学生进行价值塑造,培养他们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同时倡导学生维护和谐的语言关系和世界文化多样性,外语教材在选材上应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

选材的民族性是指所选素材应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内容切合中国学生所处的真实社会文化情境。我国目前的外语教材按照开发模式总体可分为四类:引进原版国外教材、引进国外教材进行本土化改编、国内外团队合编教材、国内团队编写本土教材。无论哪一种模式,国内团队应充分利用自身与学习者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素材挑选、审核、改编或者撰写过程中融入民族特色元素,与学习者建立强烈的情感和文化连接,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意识。与全球普适性外语教材相比,本土团队和本土化教材凭借与学习者相通的文化背景,更能促成学习者的文化反思(Weninger & Kiss 2013)。

选材的世界性首先是指在主题上要融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诸如宽容、友好、勤奋、责任感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品格应当在外语教材的素材中得以彰显。同时,选材应跳出目标语文化视角的局限来呈现多样的世界面貌。Kachru 和 Nelson (1996)曾根据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化特征将全世界分为英语内圈(the Inner Circle)、外圈(the Outer Circle)和延伸圈(the Expanding Circle)。其中内圈指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外圈包括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

家和地区,而延伸圈则指将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和地区。目前,英国、美国等英语内圈代表性国家仍是许多外语教材选材的聚焦点和文化介绍的主流。英语外圈和延伸圈国家的价值与文化尚未得到充分呈现。这显然不符合英语作为世界语的趋势,素材呈现的局限性也不利于我国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外语人才。

除了体现世界性和民族性,同一系列的外语教材各类选材之间还需要相互关联,形成系统科学的体系。在选材过程中应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教材素材既要涵盖服饰、饮食等表层文化,更要向学生介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引导学生由表及里,批判性地理解与分析各种现象及内涵。例如,《新目标》的话题和素材既包括游戏、体育等表层文化现象,也探讨职场道德、慈善文化、中华美德等深层文化。第二,按照科学框架组织教材选材,使素材具有系统性。教材编写团队需要对教材预期呈现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梳理,既可以自上而下,参照专业教学指南或者纲要提出的要点确定具体的主题以优化内容供给。例如,《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了“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育人重点,《新目标》基于这些育人重点进一步确定了相应的主题,即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A Charitable Heart、To Be or Not To Be、News、Glorified Gossip? 和 Values We Hold Dear,这样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的选材方式是国家政策得以落实的关键。团队也可以自下而上基于广泛调研、相关研究以及知识、经验积累来确定选材框架。例如,如果教材希望倡导“和谐”的价值理念,就可以从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环境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等各个层面予以呈现,将“和谐”的理念体系化地融入教材编写。总之,将各类素材通过统一的框架进行串联,可以使其具有系统性、一致性和连贯性。第三,教材选材需要将抽象的价值观念情境化和具体化。例如,为引导学生培养文化自信、欣赏多元文化、增强语言和文化安全意识,可以从外语学科特色出发,选材时关注世界各种语言分布和发展现状,关注语言保护政策,让学生在具体的话题和情境中切身感受到语言的意义与价值(徐锦芬 2021)。意识层面的内容相对抽象,而且教材使用者在解读素材时往往会受自身经历、知识积累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生动具体、情境丰富的素材能够在教材使用者的具身体验与抽象的价值理念之间搭建起桥梁,有助于他们对教材素材的深入理解。

3.3 外语教材活动设计

多元教材目标的设定为教材建设确定方向,科学有效的素材选择为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而教材活动设计则决定了编写团队以上两个步骤的努力能否有效达成预期效果。

国家安全视域下外语教材建设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发挥外语学科专业特长设计教学活动。首先,可以结合学科和课程特色设计相应的活动。例如翻译类教材可围绕译作、译家、译史等开展研讨,引导学生审视翻译活动中涉及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问题,分析口译、笔译在捍卫国家话语权,促进国际交流层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学类教材除了结合经典作品的创作背景、人物

塑造、写作手法等分析作品的时代意义,使学生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受到熏陶(徐锦芬 2021),也可从中充分挖掘“中国元素”,比如,通过“中国哲学思想在美国文学中的体现”和“中国经典作家与美国经典作家比较”等话题的探讨,启发学生运用中国文化思想和伦理价值观审视异文化中涉及的人类普遍关注的问题(杨金才 2020)。其次,编写团队可结合研究专长,在教材中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研究分析方法和框架,指导学生深入分析和挖掘课堂内外、线上线下接触的各类语篇的内涵。例如黄国文(2020)指出,除了有益性话语和中性话语,还有些语篇是破坏性话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内容,有的语篇价值取向甚至比较隐蔽,不易判断。如果外语教材能指导学生对语篇进行符号学分析或者话语分析等,将有利于提升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安全素养。

教材活动设计的另一大重要理念是把握学习者特点,以学习者为中心。其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与教材选材的标准类似,教学活动的情境和内容也应当贴近学习者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活情境,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探究欲望,增强学习者认知、情感和行为投入。已有研究表明对于熟悉的话题,学习者在行为和认知上更加投入,情感反应也更为积极(Qiu & Lo 2017)。因此教材活动形式可以多样,活动难度可以有区别,但活动的情境要让学习者有代入感。其二是应注重通过教材活动提升学习者的思辨素养。在国家安全视域下,为提升国家话语能力,参与国际事务讨论的人才需要具备就专门的国际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辩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盛静 2017)。为培养相应的人才,外语教材需要设计针对性的活动增强学生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批判性解读各类信息的能力。首先可以通过教材中的教学指令、图片、音频、视频等引起学生对文化、情感和价值观信息的注意。然后用具体的批判思维技能进行分析,从语言、技能和思维上为学生搭建桥梁,引导学生理解素材和关键知识点。接下来应结合教材素材考查学生对该批判思维技巧的运用。最后应激发学生的批判性反思,例如,基于素材的讨论、辩论、调研、汇报等活动,不仅考查学生对素材事实性信息的理解和推断,还促使学生发展分析、整合、应用等高阶思考能力。由此形成一个“注意—理解—应用—反思”的动态流程,以鼓励学生积极思考而非被动地接收信息。

4. 结语

本文从国家安全视域下解读外语教材建设的内涵,提出外语教材服务于国家安全的三重使命,并围绕其内涵和使命从目标设定、教材选材和活动设计三个方面探讨了外语教材建设路径。为了实现全方位、立体化的外语教材建设,未来还有几个方面亟待进一步研究和实践探索。

首先,需要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的外语教材开发队伍。不仅要提升教材建设团队的编写、审核、研究素养,更要加强团队成员本身的语言安全意识,为开发、出版有利于国家安全的外语教材打下坚实基础。同时要关注通过外语教材

开发提升团队成员的专业发展,助力教师的专业和职业发展,促成教材编、审、用、研的良性循环。

其次,丰富教材形式载体,解决外语教材开发中的矛盾。我们期待外语教材更多更好地呈现英语外圈及延伸圈地区的文化和价值理念,但不可否认内圈国家英语变体依然是教材市场主流,而语言变体本身带有价值取向,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Johnston 2003),对主流英语变体的推崇与多样文化及价值呈现的需求形成一种矛盾,是我国本土外语教材建设团队需要解决的难题。充分发挥信息时代文字、图像、音视频等资源的多重功能,形成多模态的形式载体是一种值得探索的解决途径。数字素材更新速度快、拓展性强,可以对纸质教材形成补充,两种媒介相融合,两种素材相互呼应、支撑,可以使得文化的呈现更加立体和丰富,更加具有时代感。

此外,现有教材评估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将是否有效融入语言和文化安全元素纳入教材评估标准之中。已有的教材评估方式主要是按照特定标准进行对照评估。从需求视角将教材作为客观对象进行分析,对教材引言、理念、设计、编排和配套素材等提出对照标准(Hutchinson & Waters 1987; Ur 1998; Cunningsworth 2002)。总体而言,外语教材评估领域对教材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属性关注度有待加强,对语言和文化安全层面的分析需要进一步深入,教材使用者也亟待提升教材评估素养。

最后,教材评估体系需要从使用者视角研究和评估外语教材的建设效果。从教师角度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教师如何解读教材中的文化和价值观信息,如何借助教材开展教学以引导学生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守中国话语权。从学习者视角来看,他们如何吸纳、解读与评价教材的文化和价值观信息,形成了怎样的语言和文化观,是否增强了文化主体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和教材建设团队来共同探讨,通过实证研究全面切实地评估教材建设成效。

参考文献

- Adamson, B. 2004. *China's English: A History of English in Chinese Education*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Cunningsworth, A. 2002.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 Curdt-Christiansen, X. L. & C. Weninger. 2015. *Language Ideology and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Textbooks in Education* [C]. London: Routledge.
- Feng, W. D. 2019. Infus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 ontogenetic analysis of social values in EFL textbooks in Hong Kong [J].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40(4): 458-473.
- Hutchinson, T. & A. Waters. 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A Learning-centred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B. 2003. *Valu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下转第 120 页)

学术创新。指向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体系构建,可催生众多研究选题;及时的科学的理论批评,可明确未来努力方向;躬行实证研究,可验证理论解释力;深入历史研究,则可夯实理论基础。本次论坛秉承务实求真的精神,围绕新时代国家翻译现实需求和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提出“国家翻译学”研究发展愿景,有助于提升国家叙事、国家翻译能力,提高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效能,增强国家翻译治理、国家传播规划、国际形象管理水平。我们期待,诸如“国家翻译断代史研究”“国家视角的翻译史研究”“国别国家翻译实践比较研究”“超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等宏阔的论题得到学界关注。

参考文献

- 方梦之. 2021. 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J]. 当代外语研究(1):29-37.
 蓝红军. 2020. 国家翻译实践——从现实需求到理论建构[J]. 外国语文(5):112-118.
 任东升、高玉霞. 2015. 国家翻译实践初探[J]. 中国外语(3):92-97,103.
 任东升. 2019.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构建[J]. 外语研究(4):68-73,112.
 杨枫. 2021. 国家翻译能力建构的国家意识与国家传播[J]. 中国翻译(4):15-19.

(责任编辑 杨 丽)

(上接第 79 页)

- Kachru, B. & C. Nelson. 1996. World Englishes [A]. In S. McKay & N. Hornberger (eds.), *Socio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102.
 Qiu, X. & Y. Y. Lo. 2017. Content familiarity, task repetition and Chinese English learners engagement in L2 use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6): 681-698.
 Thongrin, S. 2018.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Asia: Guidelines for materials writers [A]. In H. P. Widodo, M. R. Perfeto, L. Van Canh & A. Buripakdi (eds.), *Situating Moral and Cultural Values in ELT Materials: The Southeast Asian Context* [C].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87-110.
 Ur, P. 1998. *A Course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ninger, C. & T. Kiss. 2013. Culture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textbooks: A semiotic approach [J]. *TESOL Quarterly* 47(4): 694-716.
 黄德宽. 2014.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文字工作 [J]. 语言科学 13 (1):10-14.
 黄国文. 2020. 思政视角下的英语教材分析 [J]. 中国外语(5):21-29.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 [S].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沈骑. 2020. 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安全价值 [J]. 当代外语研究(2):7-13.
 盛静. 2017.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科技:应用与展望 [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85-92, 120.
 徐锦芬. 2021. 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 [J]. 外语界(2):18-24.
 杨金才. 2020. 外语教育“课程思政”之我见 [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48-51.

(责任编辑 杨 丽)



徐锦芬，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System*和*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编委，多家SSCI及CSCSI外语类核心期刊外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二语习得、教师发展。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重要课题20多项。在*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和*System*等SSCI期刊，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等外语类CSCSI期刊发表论文170多篇。出版专著和主编各类教材30多部。2017年入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语言学学科排名第12名）。

任文，博士、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翻译学院院长；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执委会副主席、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服务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中国译协口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重大翻译工作审评专家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英文国际期刊*Interpreting and Societ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联合创始主编，SSCI期刊*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编委，《中国翻译》期刊编委；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通讯鉴定专家，国家社科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和成果鉴定专家。主持国家教材委重大专项、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近20项。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口译研究、外语教育等。

